



金 沙 洲

于 逢

11318

822
1030

金 沙 洲

(修訂本)

于 逢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三年·北京

內容說明

本书描写1956年春我国广东某主要种植經濟作物的农村，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，从初級社发展到高級社阶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。作品中所描写的地区，当时高級社尚未十分巩固，社的工作中还有一些缺点，一些有严重自发资本主义思想的上中农，抗拒运动，煽动退社风潮，地主富农分子，也乘机破坏，蠢蠢欲动，一时形成混乱局面。但在党的领导下，大多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，拥护高級社的貧农和下中农，通过斗争和教育，打退了这种进攻，并用丰产的实际成績，說明了高級社的优越性，使合作化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。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尖銳复杂的斗争。

本书初版于1959年，現經作者作重大修改，重排再版。

插图：楊之光

金沙洲

书号1383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字数383,000 纸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7 $\frac{1}{4}$ 插页8

195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3年8月北京第2版

1963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50001—81000册 定价(3)1.60元
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第一 部

· 这是一九五六年的初春。……

社主任刘柏家里发生爭吵已經五天了。夫妇双方都不肯讓步，无法和解。做妻子的借口探亲，收拾几件衣服，回娘家去了。做丈夫的忙着社里的事情，沒有時間照顧家庭。五儿生了病，发着高烧。四女从台上摔下来，額角碰出了一个大庖。二女、三儿沒有什么事。大女不上学了，留在家里帮着家务。六十多岁的老媽媽忙不过来，有点吃不消了。

梁雁的娘家在龙塘村，离金斗村不过五六里，中間隔着一座不大不小的臥蚕山。娘家沒有什么人了，只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嫂嫂。她就住在他們家里。村里三十二戶人家，已經有三十戶加入金沙高級农业合作社。哥哥快五十岁了，天天忙着出勤；嫂嫂呢，在家带着孩子，洗衣燒飯。她也帮着家务，整天納悶，覺得憤恨。

呆了一天，第二天她到熟人家里串門子，談家常，但大家都忙着去开荒，只有中午或晚上才可以找到。晚上又多半有会，評工分罗，評劳动力罗，沒有什么空儿。她想参加村里的生产队去开荒，覺着不好意思。又呆了两天。哥嫂劝她，她和刘柏都是四十上下年紀的人了，还有什么好鬧呢，不如回去吧。但她不听，她說她要自己过日子。他們知道她的性子，暫时只好由她。

第五天早上，她一个人拿着镰刀，戴起竹笠，背起籮筐，准备到涌^①边去割草，正想动身，社的副主任周耀信走进来了。

周耀信是龙塘村人，每天都到金斗村去，因为金沙社的办公处设在金斗村。他先后来劝过她两次了，每次都带了一些家里的消息来。这是一个四十二岁的老实男人，性情忠厚，身体健壮，高个子，四方脸孔。左颊受过枪伤，结着一个大疤，嘴唇也有点向左扭歪了，显出仿佛吃惊的样子。据说这是他参加抗日游击队的时候给打伤的。他从游击队回来，妻子不见了，因为残废，一直不容易再婚。土改以后，他和嫁到沙涌村的梁雁的堂姊妹寡妇梁甜相好。梁雁一直想成全这件好事。当下梁雁见到周耀信，知道又是刘柏差他来的，心里便觉生气。

“二嬌，你要出去嗎？”周耀信招呼一声，就在桌边坐下来，好像以前两次一样。

“是，我要出去割草，……”她说，有点慌乱。“坐吧！”她招呼周耀信坐，自己却站着，放下籮筐，除下竹笠，却仍然拿着镰刀，仿佛就要动身的样子。

“我昨夜从金斗回来，太晚了，沒有来找你。”周耀信开始說，“我昨夜到过你們家里……”

“不，我不回去！我回去干什么？”她搶着說，激动起来。“他要有本領，就由他自己管家好了。还要我回去干什么！”

“二嬌，話可不是这样說啊！那天二叔脾气不好，他現在自己也知道了。……”

“他既然知道了，那么，他还——他为什么不自己來請我，却差你来？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她想說点什么，却又觉得没有什么

① 涌：音cong，小河。这种小河在珠江三角洲上密布如网，是水道，也是灌溉渠。

可說的。

“二叔这两天忙着社里的事，来不了。”周耀信解釋。“而且……”

“那么他忙他的社里事情好了。……”

“而且你們的振中又病了，二叔要带他去看病。”

“病了嗎，振中？什么病呀？”她問，不覺坐了下来。

“沒有什麼病，是發燒。醫生說是大概受了涼，沒有什麼大不了。”

兩人沉默了一會。

“振中病了。”周耀信又說，“二叔要你回去看看他。而且瑞梅也摔了一交，前額摔出一個大疤來。……”

“不，他要有本領管家，就由他自己管去。我什么都不管了！”她說，不明白自己在說什麼。她的心亂了。

“二嬸，你還是把氣平一平吧！”周耀信說，嘴唇微微一歪，彷彿發出感歎。“二叔對家里的事，確是照顧得少些。但為什麼呢？為了社的事呀！你不知道，社里的事情多麼難搞！我們幾個人，加上县委派來的幾個工作同志幫着，還是忙得團團轉呢！這樣，他急起來，回到家里，就不免粗聲粗氣。這個你要體諒他。你也不是不知道二叔的为人，為着公家的事，他就忘了自己。”

“這個我知道，……”她低声說，忽然覺得眼里有了淚水。

“本來呢，家里的事情，並沒有什麼大不了！”周耀信摯誠地說，低着頭，沒有看她。“我看，你還是今天回去吧。回去有事好大家商量。要是他做的不对，我們都會勸他改。他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脾氣急。……”

“脾氣急是一件。”她說，覺得委屈。“他動不動以為自己全對，別人全錯。他……他……”

“这是不对的。”

“通通都是他对了，什么事情都是我的错。那么，我回去只有碍着他们。我还回去干什么！”

說着，她又感到怨恨了。周耀信看見还是劝她不轉，只好帶着抱歉的神情走了。周耀信一走，她又有點懊悔起來。她空虛地看看四周，于是背起籬筐，拿着鐮刀，戴起竹笠，按照她原来所想的，到涌邊割草去。可是走出村門，她忽然念头一轉，覺得到涌邊可能碰到村里的人，現在她是什么熟人都不想碰到，于是折进臥蚕山的泥路去。她一路慢慢走着，心里念着振中和瑞梅，不禁难过起来。

严冬刚刚过去，臥蚕山上山草衰黃，青草很少。她走到山腰，拣青草割了一会，就坐在石头上，看着山下发起呆来。現在成立高級社，大家热热闹鬧，为什么她这样孤单呢？她本来是有一个家的，为什么自己不能回去呢？到底有什么事情，能使她非和刘柏决裂不可呢？近年来她和刘柏經常发生意見，两个人时常說不了几句就頂起来，一两个月就吵一次，但都很快和解了。这次算是鬧得最凶的。

那天早上，她照例起来烧早飯。刘柏去大榕树前看生产队出勤，很久沒有回来。她只好自己先吃。她想，自留地已經松了土，應該及时去种芋头，早种早收，将来青黃不接的时候，可以拿来頂米糧。这样一想，就把第三生产队队长刘騷仔叫她去开荒的事忘了。于是戴起一頂竹笠，挽一个竹籃，籃里放一些芋头，一把地鍬，走了出去。不料在巷口碰到刘柏回来。刘柏肩上披着旧棉袄，赤着脚，皺起了眉头，显然为着什么事情着恼。她看了他一看，知道不外是为着社里的事情，于是安慰似地低声說：

“回來了嗎？鍋里有一大碗稀飯，用火暖着。还有一些芋头、咸蛋。阿婆和孩子都吃过了，不用再留給她們。……”

“你到哪里去？”刘柏从她身旁擦过，忽然回头粗声問道。

她很覺詫異，不禁停住脚步，生疏地瞟了他一眼。她知道他所不滿的是什么了。但她一点也不怕，坦然回答道：

“去种芋头罗！”

“为什么不去开荒，却去种芋头？”他仿佛要审判人。

“为什么一定要去开荒呀？我就是要去种芋头！”她心里一跳，猛然記起昨夜刘騷仔的交代，但她不能当面認輸。

“去种芋头嗎？——是去搞自留地！”他大声說，“人家去搞自留地，你也去搞自留地！好的你不去学，却去学那些差的！……”

“对呀！我是去搞自留地！”她急促地說，准备和他針鋒相對。“我現在不去搞自留地，不去种芋头，将来要連飯都沒得吃了，誰給孩子們飯吃？高級社嗎？”她用嘲弄的声音，說出“高級社”三个字。

刘柏給她气坏了，面对她站定，用她最討厭的訓諭口吻說：

“你們現在沒有飯吃嗎？你能說这个話？自从并社升級以后，你老說这个話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記不清和你說過多少次了：暫時的困难，将来一定能够克服，我們不只要看目前，还要看看将来。但你怎么也想不通，就是舍不得那份土地分紅。要是大家都像你那样，高級社只好散了伙完事！社会主义的路也不要走了！”

“社会主义？”她用鼻音說，“哼，等到社会主义，人早死了，骨头也可以打鼓了！……”她站在那里，似乎还想說些什么不中听的話，但又克制了自己。

“好吧，将来你总会知道的！”她忽然說，一下轉过身来，登登

登地跑回家里，把竹籃一攢，把地鍬一摔，就拖着鐵鋤走出来，也不看刘柏，向大榕树那边去了。

鋤头拖在石板路上跳着响着。

“喂，你疯了嗎？”刘柏在她背后大声吆喝，声音里带着憤怒。
“当心把鋤头弄坏呀！”

中午回家吃饭，她把碗筷弄得直响，大声喝罵哭鬧的孩子。刘柏埋头吃饭，一声不响。这样，她本来不該再鬧了，但她不能压抑自己。她看見十岁大的女儿挂着紅領巾，也不脫下来就吃饭，于是发話道：

“你挂着紅領巾很得意嗎？要把它早点弄破才心安嗎？你弄破了，哪里再找錢来买？”

瑞兰抬起眼睛瞪着她，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么事。

“明天，你把紅領巾交回去！”她命令說。“不，不必交回去，給我收起来。你告訴你老师，說你不再參加少先队了。參加少先队，整天开会，沒有一点時間。你告訴你老师，說你要帮家务，要下地掙工分。再不掙工分，家里就餓飯了！”她故意把“餓飯”两字說得很响。

刘柏看了她一眼，沒有說什么。要是这时她能控制一下，事情也不会再鬧大了。但她不能，她把自己的不滿，一齐发泄在可怜的大女儿身上：

“你听不到我的話嗎？把紅領巾脫下来！”她下命令了。

“你这是怎么說的！”刘柏喃喃地說，“孩子參加少先队活动，难道不是好事！”

“沒有時間下地掙工分，就不好！”她故意說，并沒有看刘柏。

“孩子參加学校的活动，不要拖她的后腿。”刘柏慢慢抬起头来，神色不很愉快。

“对，我是拖她的后腿，我是自私自利！”

“我只是說你不要拖她的后腿，我並沒有說你自私自利。”

“对，我是自私自利，我是一个落后分子！”她大声說，虽然感到自己横蛮无理，但也不管了。

她抱着小儿子振中走进臥房。 振中哭起来，她咬牙切齿地罵道：

“哭什么，該死的！你現在哭，还早着呢！将来餓飯，你才知道！”

刘柏脸色刷地一紅，把筷子一放，喝道：“你发脾气，你就自己把头撞到墙上去好了。用不着罵孩子！”

就这样，他們吵开了，左邻右舍都劝不住。待駐社干部林卓洪和其他工作同志赶来的时候，她早收拾衣物走了。

“他当个高級社主任，就摆起架子来，样样事情都要教訓人，样样事情都是他对。 哼！”当下她呆看着山下想，无名的怨恨又抬头了。

珠江三角洲的早晨是十分明媚的。春雨在悄悄下着。龙塘村的灰色房屋挤靠在一座矮岡前，藏在一簇黑綠色的树林包围中。四周展开蔗林的大海，望不到头，显得滿眼悅人的鮮綠。蔗林中間，露出一面面的魚塘，像鏡子似地发亮。 迷蒙的远处，橫着一条銀帶子似的珠江。珠江的那边，是一片浅綠色的烟雾。远处的村庄已經看不分明，只有絲厂的几根黑色烟囱惹眼地豎立在那里。太阳隐沒着，只見在灰色的天空中間显出一圈黃光。衰黃的山草都洗湿了，聚着水珠。 青草已經在許多地方鮮艳地冒了出来。四周非常靜寂，什么地方传来鳥儿的嬉戏声。 山頂上的几棵大松树在隱約吟鳴，綠得发蓝。 泥土飽含着水分。空气里流蕩着一种溫暖的悶人的气息。严冬已經过去了，春天是

来了。

四周的景色，梁雁是熟悉的。她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她的童年、幼年和少年。过去的回忆忽然鲜明地浮现在她眼前了。六七岁的时候，她是经常跟着妈妈到这里捉虫虫玩的。十二三岁，她曾拿着树枝，在这里放过牛。十六七岁，当她长成了，她曾坐在这里唱过歌，做过少女的梦。她曾幻想到对江的丝厂去当缫丝女工。后来她果然当上了，但不到两年，丝厂倒闭了，她也就失了业，回到乡里，和农民刘柏结了婚。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间，她曾和刘柏到这里躲过难，亲手在这里埋葬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，她曾坐在这里哭泣过，而且梦想过将来的美好的日子。这美好的日子是：日本鬼子打跑了，他们不再受土匪的威胁，不再受官僚地主的欺压，一家人得到团聚，每天有两顿饭吃，自己有衣服穿，孩子有书读。现在，这些通通实现了，但她反而感到无名的怨恨。这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……

二

梁雁走了，刘柏仍然和以前一样，只是回家吃饭睡觉，其他时间不是在社里，就是去看生产。直到振中生了病，他这才觉得家里缺少了一个人，托周耀信去劝梁雁回来。他每次和梁雁争吵，当时确实很生气的，但过后也就忘了。高级社建成不到一个月，事情很多，要编生产队，划耕作区，要制订短期作业计划，审定工作定额，要评劳动力，计算入社股金，同时开荒要限期完成，积肥数字要每天上报，甘蔗赶着要种，鱼塘必须及时清理。过去他当金沙乡第一初级社主任的时候，管的只是三四十户人家，现

在管的却是金斗、沙涌、龙塘三个村二百五十多户的事情，忙忙乱乱。日间和夜里，各种各样的人来找他。不管他在社里，在家中，不管他在工作，在吃饭，他们找到他，就要他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。生产队长找他谈论工分啦，借钱的人找他批准预支啦，病人的家属找他商量看病啦，谁和谁吵架找他评理啦，诸如此类。这样，他就把家里的小事搁在一边了。

振中发着高烧，消瘦下去，两眼无神，他看着觉得应该去看医生了，只好抽空抱到镇上去看。晚饭时候，喂了第二次药，热度开始消退。他抱着这个不到周岁的孩子在厅子里踱来踱去，想哄他睡。但孩子却怎么也不肯睡，反而哭起来。刘柏沒了法，只好交给老妈妈。老妈妈抱着、哄着，他还是哭。刘柏很不耐烦，问道：

“为什么还哭，这家伙？热不是退了一些吗？”

“他要找他媽抱……”柏母低声说，继续哄着孙儿。

刘柏不作声了。

“孩子自从断了奶，没有什么东西吃。”柏母一边哄着，一边低声咕噜，“每天只吃些稀饭咸菜，身体瘦弱了，就容易害病。……人家的孩子，比方执胜叔的阿龙，手腕像藕节一样，从来就不见他害病！……”

刘柏重新坐在桌边吃饭，偷眼一看，发现孩子果然瘦弱。他再看看其他的几个孩子，也都有点面黄肌瘦。大女十岁，二女八岁，三儿五岁，四女三岁，都长着妈妈一样的瓜子脸孔，大眼睛，翘下巴，带着倔强的样子。他们一个跟着一个高高兴兴热热闹闹地来到他的家庭，而他却没有很好接待他们。家里太穷了，一向穷，现在也不富裕。每天只能勉强撑持过去，吃两顿干的，一顿稀的，是一个新下中农的家庭。

“执胜？人家可和我們不同啊。”刘柏吃完饭，低头卷着生切烟說，一边想道：“人家执胜是上中农呀，自然不同。……她今天为什么也說出这样的話来呢？她平日不是很看得开嗎？”

年老的母亲，头发都花白了，却还硬朗。样子和刘柏像极了：略高的額骨，稍稍尖突的嘴唇，仿佛随时都准备展开舌战，向人进攻。她瞥了刘柏一眼，似乎已經看透了儿子的心思，說道：

“正因为这样，阿雁才看着覺得气悶。她在外边听了別人的閑言閑語，說你当了个社主任，棒起来了，其实家里就是这样。”

母子两人忽然都沉默下来了。老人家走进厨房去。刘柏坐在厅子里抽着生切烟，看看自己窄狭破旧的住宅，心里感到一阵疚歉。

“再过三五年吧！社办好了，大家也就都好了。”他想，“但是社要办不好，什么也談不上。好在目前情况还好。这两天出勤率大大提高了，已經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。”接着，他的思想又轉上固有的軌道上：“不过，大家集中力量开荒，把种蔗丢了，也是問題。蔗种得迟，就会影响将来的收成。……还有，我們金沙这三个村子，还有二十九戶农戶沒有入社。入了社的，也有个别的人不稳定。據說梁甜就很动摇……”

想到这里，他感到自己眼前有一件事情要做，于是带了手电筒，动身到沙涌村去。

沙涌离金斗不过三里路，中間隔着一条涌水。从大榕树轉出去，过了桥，沿涌边走一段路，再穿过一片蔗林，就到了这个七八十户人家的小村。沙涌和金斗过去曾經械斗过，两村长期有积怨，从来不通婚。过去金斗人去县城，宁願繞着路走，也不經过沙涌。沙涌人放牛，宁願到別处去放，也不来金斗臥蚕山放。有时来了，碰到金斗人，不是吵嘴，就是打架。孩子們在涌边碰

着，也互相瞪眼睛，扔石头。土改以后，彼此的成见消除了，可是时常还发生一些小矛盾。沙涌人以为金斗人恃着村大人多，好欺负人；金斗人以为沙涌人横蛮厉害，专会占便宜。成立高级社的时候，沙涌本来想自己搞一个社，没有实现。刘柏是金斗人，怕沙涌人说他偏着金斗，也怕自己真有偏袒，一向对沙涌的事情格外关心。

沙涌半边村环绕着一弯静静的涌水，沿涌种着一列美丽的水松树。闸门是狭窄的，破旧的。村里好多房子都塌了，烧了；这是日本鬼子的罪恶遗迹。有的还露着瓦砾，有的已经种上木瓜、香蕉、蔬菜。村道曲折窄小，灰砖屋子低矮而且阴暗，显着忧郁的神情。村南沿着涌边，是一带棚寮。黄泥糊的墙壁，蔗叶盖的屋顶，有些伸出杉木的腿子，把屁股跨站在涌水边上，仿佛给什么挤了出来似的。在棚寮行列中间，出现五六幢新建的砖屋，显得年轻有为，生气勃勃。式样也和一般的古老房子不同，是经过局部改革的。石灰是新刷的，有些屋脊上还镇着一只治邪的陶金鸡。以前这里住的都是贫雇农。现在情况变了：有的依然是贫农，有的已经上升为下中农或上中农。其中一间特别高聳惹眼的砖屋，是郭细九的住宅。副主任郭有辉的一间砖屋，还没有全部建成，只有一进。预备的砖方堆迭起来，围着门口，好像一堵围墙。

“唔，这里砖屋倒盖了不少呢！”刘柏想，不禁看看两旁依然破破烂烂的棚寮。

他走到梁甜的棚寮前，看見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子坐在门槛上，正在吃粥。上身穿着一件蓝短袄，下面是一条破短裤，露出半边腿子。流着鼻涕，小脸抹着泥污，像个滑稽的小丑；但脸色却是满严肃的。他虽然认得刘柏，两只小眼睛还是紧紧盯着，仿

佛提防什么。

“坤仔，你媽在家嗎？”劉柏俯身問道。

“媽媽，有人找你！”他並不回答劉柏，却捧着飯碗往屋裏走。“有人找你喲，媽媽！”

梁甜正在家里吃飯。梁甜本人、瞎了一只眼睛的婆婆和八岁的大女儿都在。粥鍋擺在地下，碗碟放在滿是油污的破圓桌上。她們有的站着，有的蹲着，有的坐在床邊，正在捧着碗子吃粥。粥鍋蓋着，從破蓋縫間冒出熱騰騰的蒸汽。擺在桌上的碟子，盛着一些霉得发黑的咸蘿卜片，還有幾個欒角。

梁甜站起來招呼：

“二叔，坐啊！”她忙亂起來，要搬木椅。

“不用，不用！”劉柏忙說，在床邊坐下。“你們吃吧，吃吧！”

“二叔你吃過了嗎？”婆婆睜起一只老眼看着劉柏。

“吃過了。你們吃吧，吃吧！”劉柏一邊掏出烟盒，一邊偷眼看看四周。

這是一間破舊的棚寮，年久失修。門外搭着个小棚，棚下堆着作柴燒的干蔗葉。門邊檐下擺着几堆石頭，還有一个破火爐，算是廚房。房子里并排放着两张木板床，床上鋪着散了邊的破草席，堆着一堆棉被似的东西。头上挂着滿是補釘的黑蚊帳。牆邊擺着一張缺了腿的方桌，四把丢了靠背的旧木椅。此外，什麼都沒有了。泥糊的牆壁有些地方剝落了，露着竹編的肋骨，有些地方還穿了洞，可以看見外面的涌岸和蔗林。

“這裡還有一點，你吃吧！”梁甜蹲下來揭開鍋蓋，舀起一瓢子粥，倒在婆婆的碗里。

“你吃吧，我够了。”婆婆說。

“我也够了。”